

◇依据教育部推荐的中学生必读书目编写

主编：傅璇琮 彭定安 刘继才

◆ 艾荫范 编著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楚辞

诠释与解读

07.22



* T158357 *

★“我与中外文学名著对话”系列丛书★

主编 傅璇琮 彭定安 刘继才

《楚辞》诠释与解读



范荫 编著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楚辞》诠释与解读/艾荫范编著. - 北京: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2. 12

(我与中外文学名著对话/傅璇琮, 彭定安, 刘继才主编)

ISBN 7-5007-6364-6

I. 楚... II. 艾... III. 楚辞—文学研究—青少年读物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94791 号

我与中外文学名著对话

《楚辞》诠释与解读

出版发行: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人: 

编 著: 艾荫范
责任编辑: 赵海力

责任校对: 贺泽红
责任印务: 李建国

社 址: 北京东四十二条21号
电 话: 086-010-64032266

邮政编码: 100708
传 真: 086-010 64012262

印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880×1230 1/32
2003年1月北京第1版
字数: 6300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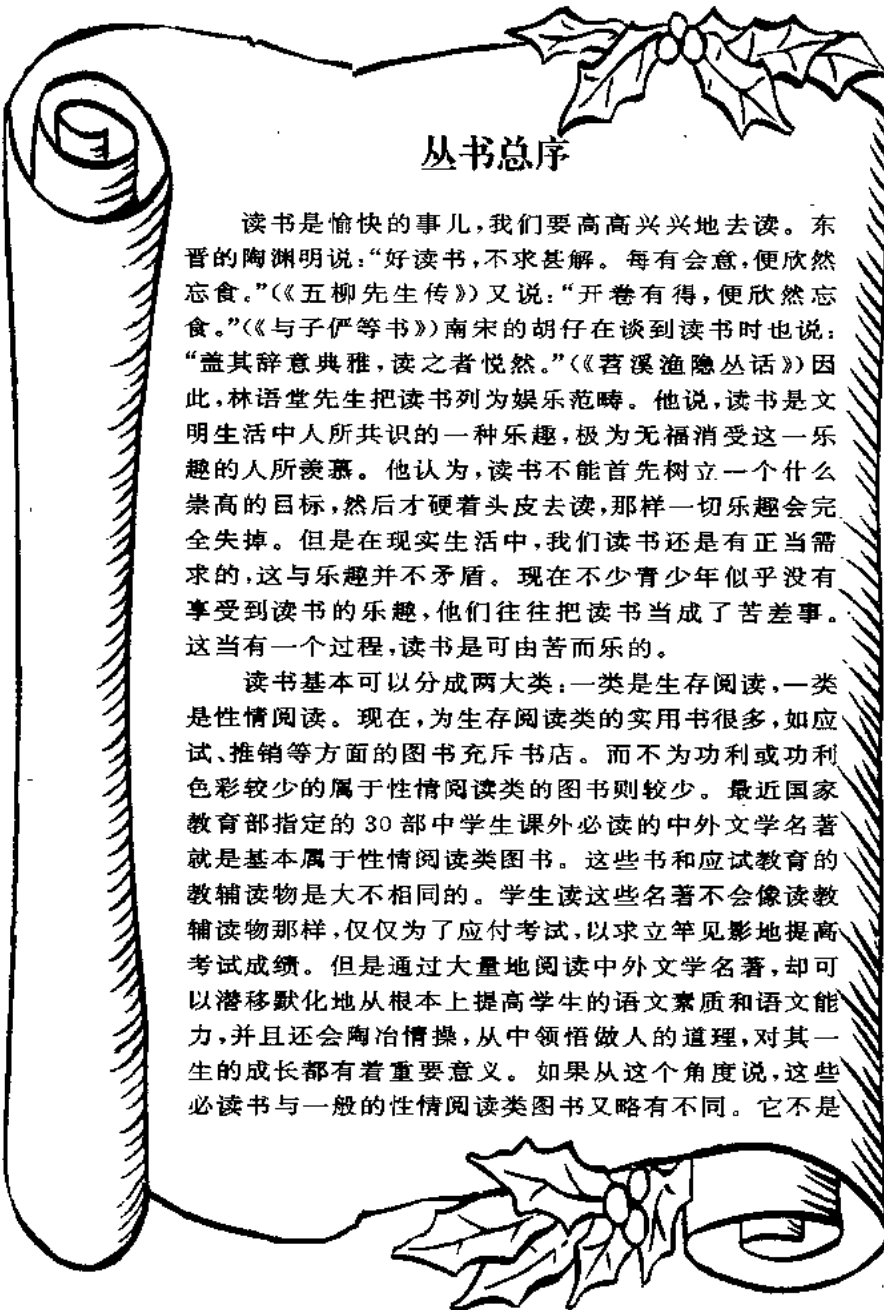
印张: 315
2003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5000

ISBN 7-5007-6364-6, I·410

定价: 600.00元(全套 50册)

图书若有印装问题,请随时向本社出版科退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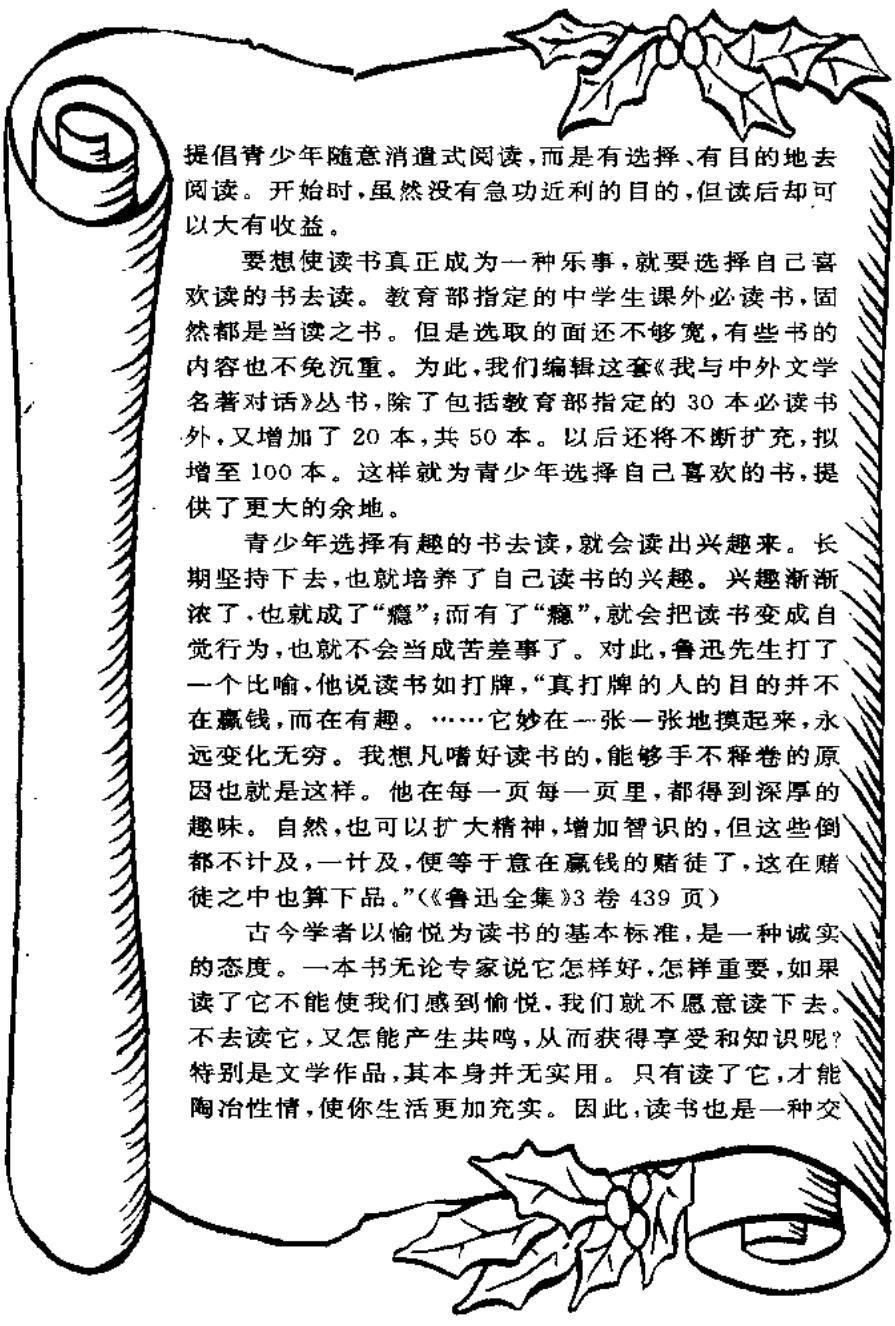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丛书总序

读书是愉快的事儿，我们要高高兴兴地去读。东晋的陶渊明说：“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五柳先生传》）又说：“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与子俨等书》）南宋的胡仔在谈到读书时也说：“盖其辞意典雅，读之者悦然。”（《茗溪渔隐丛话》）因此，林语堂先生把读书列为娱乐范畴。他说，读书是文明生活中人所共识的一种乐趣，极为无福消受这一乐趣的人所羡慕。他认为，读书不能首先树立一个什么崇高的目标，然后才硬着头皮去读，那样一切乐趣会完全失掉。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读书还是有正当需求的，这与乐趣并不矛盾。现在不少青少年似乎没有享受到读书的乐趣，他们往往把读书当成了苦差事。这当有一个过程，读书是可由苦而乐的。

读书基本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是生存阅读，一类是性情阅读。现在，为生存阅读类的实用书很多，如应试、推销等方面的图书充斥书店。而不为功利或功利色彩较少的属于性情阅读类的图书则较少。最近国家教育部指定的30部中学生课外必读的中外文学名著就是基本属于性情阅读类图书。这些书和应试教育的教辅读物是大不相同的。学生读这些名著不会像读教辅读物那样，仅仅为了应付考试，以求立竿见影地提高考试成绩。但是通过大量地阅读中外文学名著，却可以潜移默化地从根本上提高学生的语文素质和语文能力，并且还会陶冶情操，从中领悟做人的道理，对其一生的成长都有着重要意义。如果从这个角度说，这些必读书与一般的性情阅读类图书又略有不同。它不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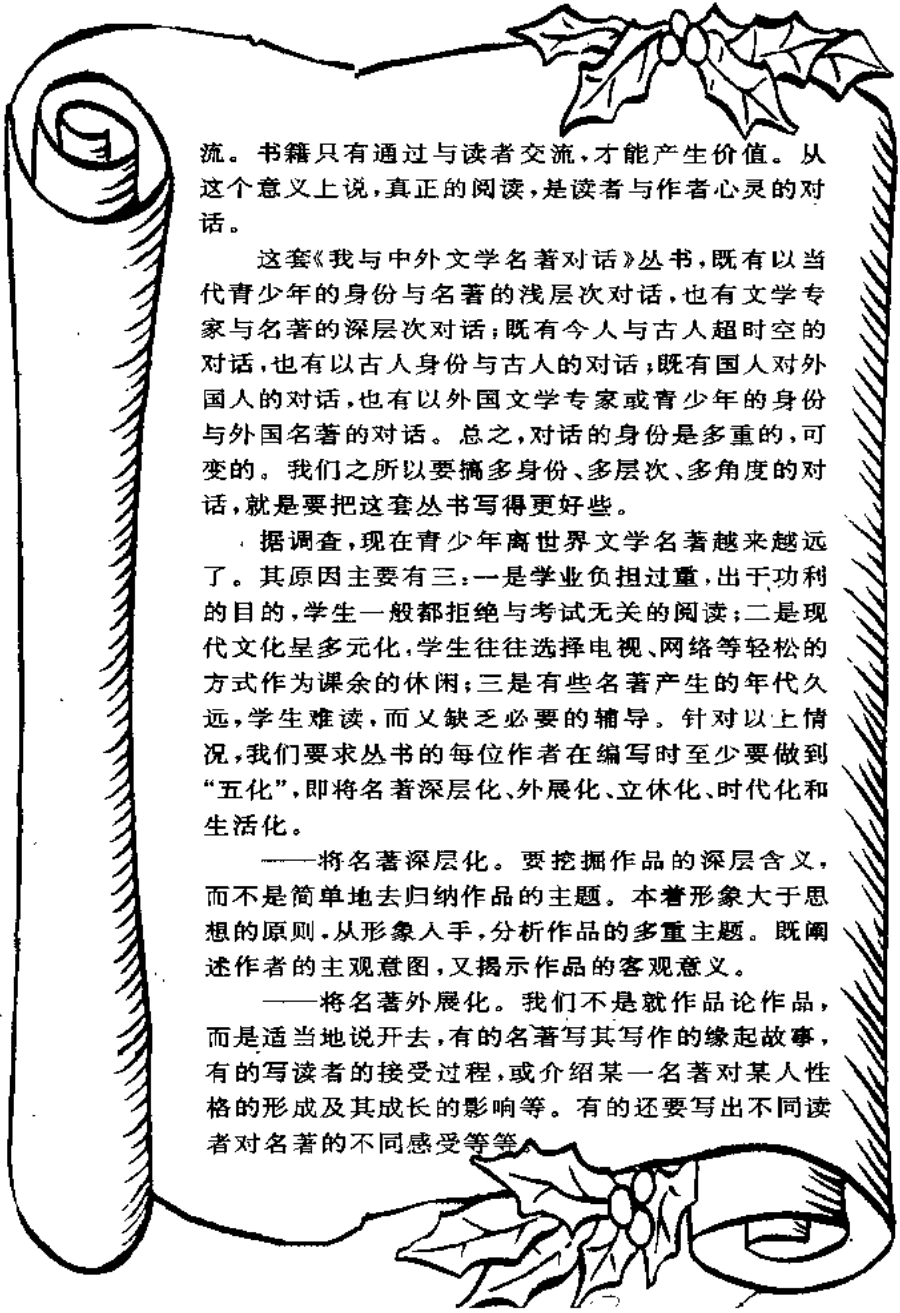


提倡青少年随意消遣式阅读,而是有选择、有目的地去阅读。开始时,虽然没有急功近利的目的,但读后却可以大有收益。

要想使读书真正成为一种乐事,就要选择自己喜欢读的书去读。教育部指定的中学生课外必读书,固然都是当读之书。但是选取的面还不够宽,有些书的内容也不免沉重。为此,我们编辑这套《我与中外文学名著对话》丛书,除了包括教育部指定的30本必读书外,又增加了20本,共50本。以后还将不断扩充,拟增至100本。这样就为青少年选择自己喜欢的书,提供了更大的余地。

青少年选择有趣的书去读,就会读出兴趣来。长期坚持下去,也就培养了自己读书的兴趣。兴趣渐渐浓了,也就成了“瘾”;而有了“瘾”,就会把读书变成自觉行为,也就不会当成苦差事了。对此,鲁迅先生打了一个比喻,他说读书如打牌,“真打牌的人的目的并不在赢钱,而在有趣。……它妙在一张一张地摸起来,永远变化无穷。我想凡嗜好读书的,能够手不释卷的原因也就是这样。他在每一页每一页里,都得到深厚的趣味。自然,也可以扩大精神,增加智识的,但这些倒都不计及,一计及,便等于意在赢钱的赌徒了,这在赌徒之中也算下品。”(《鲁迅全集》3卷439页)

古今学者以愉悦为读书的基本标准,是一种诚实的态度。一本书无论专家说它怎样好,怎样重要,如果读了它不能使我们感到愉悦,我们就不愿意读下去。不去读它,又怎能产生共鸣,从而获得享受和知识呢?特别是文学作品,其本身并无实用。只有读了它,才能陶冶性情,使你生活更加充实。因此,读书也是一种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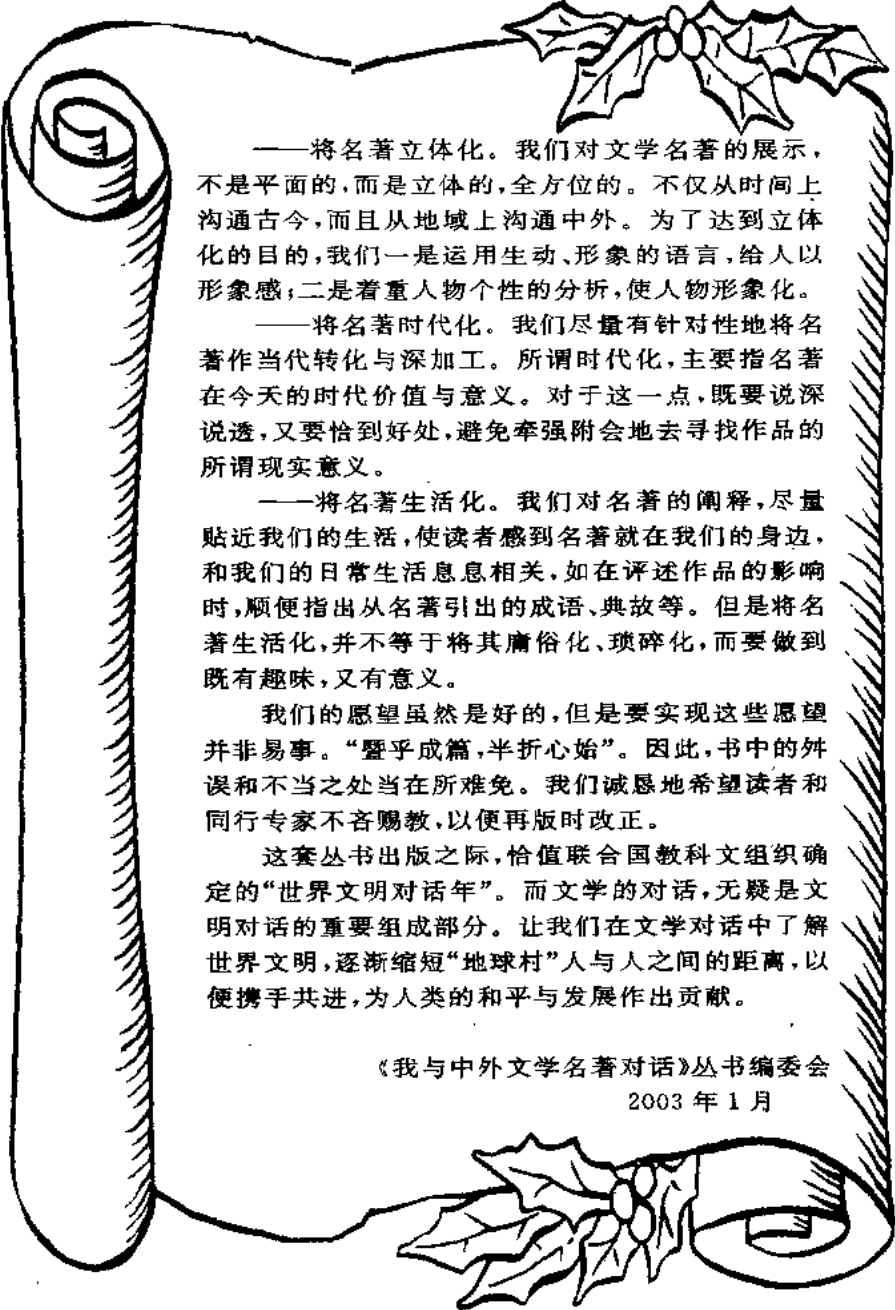
流。书籍只有通过读者交流，才能产生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真正的阅读，是读者与作者心灵的对话。

这套《我与中外文学名著对话》丛书，既有以当代青少年的身份与名著的浅层次对话，也有文学专家与名著的深层次对话；既有今人与古人超时空的对话，也有以古人身份与古人的对话；既有国人对外国人的对话，也有以外国文学专家或青少年的身份与外国名著的对话。总之，对话的身份是多重的，可变的。我们之所以要搞多身份、多层次、多角度的对话，就是要把这套丛书写得更好些。

据调查，现在青少年离世界文学名著越来越远了。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学业负担过重，出于功利的目的，学生一般都拒绝与考试无关的阅读；二是现代文化呈多元化，学生往往选择电视、网络等轻松的方式作为课余的休闲；三是有些名著产生的年代久远，学生难读，而又缺乏必要的辅导。针对以上情况，我们要求丛书的每位作者在编写时至少要做到“五化”，即将名著深层化、外展化、立体化、时代化和生活化。

——将名著深层化。要挖掘作品的深层含义，而不是简单地去归纳作品的主题。本着形象大于思想的原则，从形象入手，分析作品的多重主题。既阐述作者的主观意图，又揭示作品的客观意义。

——将名著外展化。我们不是就作品论作品，而是适当地说开去，有的名著写其写作的缘起故事，有的写读者的接受过程，或介绍某一名著对某人性格的形成及其成长的影响等。有的还要写出不同读者对名著的不同感受等等。



——将名著立体化。我们对文学名著的展示，不是平面的，而是立体的，全方位的。不仅从时间上沟通古今，而且从地域上沟通中外。为了达到立体化的目的，我们一是运用生动、形象的语言，给人以形象感；二是着重人物个性的分析，使人物形象化。

——将名著时代化。我们尽量有针对性地将名著作当代转化与深加工。所谓时代化，主要指名著在今天的时代价值与意义。对于这一点，既要说深说透，又要恰到好处，避免牵强附会地去寻找作品的所谓现实意义。

——将名著生活化。我们对名著的阐释，尽量贴近我们的生活，使读者感到名著就在我们的身边，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如在评述作品的影响时，顺便指出从名著引出的成语、典故等。但是将名著生活化，并不等于将其庸俗化、琐碎化，而要做到既有趣味，又有意义。

我们的愿望虽然是好的，但是要实现这些愿望并非易事。“暨乎成篇，半折心始”。因此，书中的外误和不当之处当在所难免。我们诚恳地希望读者和同行专家不吝赐教，以便再版时改正。

这套丛书出版之际，正值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的“世界文明对话年”。而文学的对话，无疑是文明对话的重要组成部分。让我们在文学对话中了解世界文明，逐渐缩短“地球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以携手共进，为人类的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

《我与中外文学名著对话》丛书编委会

2003年1月

目 录

一、引言：化石生态沉思录	1
(一) 在鲲鹏变化的背后	2
(二) 南国诗圣的悲怆故事	6
(三) 大江翻澜神曳烟	14
二、名篇解读	18
离骚	19
九歌	65
东皇太一	68
云中君	71
湘君	74
湘夫人	78
大司命	83
少司命	87
东君	91
河伯	95
山鬼	99
国殇	105
礼魂	109
九章	111
哀郢	112
怀沙	119
橘颂	124
天问	128

招魂	139
卜居	157
漁父	161
九辯	165
招隱士	173

一、引言：化石生态沉思录

2001年3月23日，就在新闻媒体刚刚报道出，前苏联和平号宇宙空间站走完它十五年历程，行将于北京时间14点30分坠入南太平洋的时候，本书编者抚案捉笔，开始演绎二千三百年前，也如一颗巨星般陨落汨罗江的南国诗圣的悲怆故事，这当然纯属一种偶然。

可是，历史有多少事件不是偶然？我们即从这个纯属偶然的瞬间开始……

（一）在鲲鹏变化的背后

孕育了南国诗圣屈原的楚民族，本是揭开华夏文明史第一页的夏民族的嫡系子孙。

楚人确信他们和夏民族同是北方天帝颛顼之后，这段渊源赫然地写在《史记·楚世家》，屈子《离骚》开宗明义第一句也声言他们是“帝高阳之苗裔”。载记中的楚族与楚国远在草长莺飞的江汉之南，但帝颛顼却统治着“北至今正（按即令丁，古民族，活动于今俄罗斯贝加尔湖一带）之谷，有冻寒积冰，雨雾霜霰”的“北方之极”（《淮南子·时则训》）。颛顼死后葬在务隅（或作附禺、鲋鱼、封嵎、欧隅）之山，也就是神话中颛顼殒斃的委羽之山，而以上诸名通通不过是汉代隶属辽东郡的无虑的音转，而无虑，颜师古明白地说“即所谓医巫闾”（《汉书·地理志》注），这座山此刻就如曝露于阳光下的鲸背，展现在本书编者的望眼之中。颛顼大帝的事迹，几千年中一直保留在与楚民族有同样亲缘关系，但后来却被误认作“异族”“别种”的鲜卑族的记忆中。《晋书》清楚地记着，慕容廆这个昌黎棘城鲜卑人，“以大棘城即帝颛顼之墟（旧迹、遗址）也，元康四年乃移居之”（《慕容廆载记》）。对于大棘城的地望尽管专家们尚无一致意见，但大抵不出阜新、北票、朝阳一带，查海、胡头沟、牛河梁某一遗址或可当之^①。古史还称颛顼之父昌意“降居若水”，娶蜀山氏女生颛顼，后世因以为这一古族源于四川。可是早在三十年代杨宽先生就指出：蜀山之蜀或又作澗，澗即涿，黄帝战蚩尤之涿鹿即蜀之古读，

地望在今之河北。本书编者补充说：蜀字如果去掉后加的形状符“虫”字，宛然就是出土于内蒙古三星他拉之玉雕大目龙，它是红山文化的代表文物之一，如今作为市徽卓立于赤峰。因此可以说，东起辽河平原，中越医巫闾、努鲁尔虎乃至燕山山脉直至晋、陕北陲，囊括整个西拉木伦河流域这横亘后来长城之外的千里北温带草原区，原为以颛顼为代表的先夏民族发育的摇篮，它创造了以玉龙为代表的红山文化，至今尚未被学者们揭开神秘面纱。

这个民族后来南迁。《庄子·逍遥游》的开篇以寓言形式叙述了这一历史事件，说北海一条体长千里的大鱼其名为鲲，变成翼若垂天之云的大鸟其名为鹏，这生灵奋力而飞，借六月里的龙卷风上升至九万里高空，终于迁至南溟。我们试作破译。鲲就是鲛，《史记·夏本纪》说他是颛顼之子，是建立夏王朝的禹的父亲。但在神话中，鲛却是一只“玄鱼”，三足鳖；而从上古语音破译，鲛就是共工、玄冥，也就是蛙或鼃的上古音读。鹏读作风，凤皇，或曰玄鸟，或称朱雀，作为古楚民族图腾，它出现在长沙出土的帛画中。由此我们就明白了这则寓言中何以出现超乎想像的庞然大物，因为南迁乃是一个创造了一代王朝的英雄民族的雄图壮举。

由夏民族中分化出楚民族，大约是在前者受到同样是北方民族商的迫胁之后。这史迹也是以神话形式记载着，说颛顼曾孙重和黎做商的始祖帝喾高辛氏的火正，其时共工氏作乱，帝喾使重、黎诛之而不尽，乃于庚寅日诛重、黎，复命其弟吴回代重、黎之职，这即是楚民族的直接的祖先（《楚世家》）。商民族把夏民族渐渐排挤出中原而边缘化，最终一举伐桀亡夏，取而代之。夏民族的南下并与当地土著融合，不仅产生了楚民族，而且东南方之越，西南方之蜀，也莫不是夏王朝崩坍前后的产物。随着一个古老

民族的迁移，于是文化也因之而更动背景。这样，在古越族的根据地会稽才有禹穴，才有禹大会诸侯而诛防风氏的传说；在四川盆地，既有前面提到的大禹的母亲蜀山氏的故乡，又有禹凿三巴疏通江水的圣迹——请读者朋友掩卷稍事思索，如果这不是故事随主人迁移而更动背景，即便科学技术发达的今天，请问一任水利部长能不能横跨数省区干出这么多的大工程？所以本书编者推测，不论浙江余杭良渚文化的典型器物那精美绝伦的玉琮，还是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高达 260 厘米造型诡异的纵目铜俑，最终可能都会同先夏民族创造的红山文化联系起来。

这个民族是如此之富于首创精神。远古华夏的水利与农业与它相关，大禹治水便是明证。象征着中华民族的龙也是这个民族的发明。“颛顼乘龙游四海”，被活生生地塑在河南濮阳（当时称帝丘）；李义山《九成宫》中的俊语：“云从夏后双龙尾”，说的是夏后启在大乐之野“乘两龙，云盖三层”，此典出《山海经·海外西经》；旧籍还载帝孔甲时有螭龙氏、御龙氏，龙在夏朝几成习见之物；而我们尤不应忘记，当年鲁迅先生拿来开玩笑的已故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考据出的那则结论：“大禹是一条虫”，“虫”实则还是龙，后来在神话中又分化成了为大禹导从的应龙。夏民族更惊人的创造是天文历法。北方圣人孔夫子精择三代文物，说“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可见对夏的历法之珍视程度。“星与日辰之位皆在北维，颛顼之所建也”，（《国语·周语》下）颛顼历一直沿用到汉武帝元封七年（前 104）才被太初历逐步代替，持续了六、七千年！前面提到可能是“颛顼之墟”的辽宁朝阳牛河梁古圆形祭坛，有关专家测算，它就是演示上古历法建构的盖天图。这使我们很自然地就把它同古埃及金字塔、拉丁美洲的玛雅神庙联系了起来，不由不对中华远古文明产生一种由衷的崇敬。

本书编者所以不惮其繁地称颂夏朝文物之盛，原因是学者们每当追溯楚民族历史的时候，所看到的只是周武王克商不过封楚君熊绎为子男之爵，楚人叙其开国之初也说先君们“辟在荆山，筮路蓝缕，以处草莽”如何艰难，这就掩盖了楚国在春秋战国期间何以能够称霸称雄，有如彼强大之国势；国亡之后，又何以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信心；屈原赋中何以记载夏朝史迹远远超过先秦任何一部古籍，并且有那样丰富的文化内涵与积淀；楚文化，何以经过强秦的践踏之后，仍旧保有强大生命力，又在整个汉王朝复兴——一句话，掩盖了楚文化乃是夏文化在南中国的延续这样一个最紧要的事实！

(二) 南国诗圣的悲怆故事

天帝之胄，其后必大。终春秋、战国五百五十年间，楚始终以一个泱泱大国的雄姿跨踞在江南。在春秋，它是五霸中的强者，自齐桓公霸业消歇之后，中原诸侯堪与楚国争胜者只有晋，故而春秋七大战役中有三大战役发生在晋楚之间。到了战国，楚的国力益增，版图进一步扩大，江汉淮徐一带小国尽并于楚，而七雄之中，能同楚国较力的又只有强秦，故而当时的纵横家苏秦如此擘划：“纵合则楚王，横成则秦帝”。秦楚堪称当时华夏土地上的两个超级大国。

构成楚国综合国力的，除了发达的农业、先进的冶金业等物质生产力外，雄厚的文化积蕴同是重要因子。在春秋时代，楚灵王的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在当时就是大学问家。哲学家李耳出生于楚国苦县，他的学问为北国圣人孔丘深深折服，不敢不执弟子礼。孔丘南游过楚，遭到楚狂接舆的嘲笑，接舆的一曲《凤歌》，折射出楚文化的深厚根基。楚国人才济济，以致当时有“楚材晋用”之说。综上所述，正是这样一具健壮的母体，才孕育了南国诗圣，给了他成长以必要的营养条件。

屈原出生在公元前三百四十年上下^①，时当战国中叶，楚宣王末而威王初。屈姓是楚王族一个支系。做为贵胄，屈原受过良好的教育，史称其“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如果在邹鲁的孔门，兼言语、政事、文学三科，

可以说是全才。从屈原的作品中，我们足以对这位时代巨子学识的博大精深略窥一斑。他从道家那里接受了以元气说为核心的宇宙创成理论（见《天问》），这不仅远离了宗教神学，而且同把人天关系绝对对立起来，不信天道，但也不肯穷追天道的儒家的科学蒙昧主义也划清了界限，使他在哲学世界观方面站在了当时的最前沿；而正是这种宇宙观支持他对社会、历史、人生的最彻底的怀疑，以致早于法国的高更两千三百多年，我们就听到了那震撼大地、穿透时空、亘古常新的沉重追问：“我们来自哪里？我们身为何物？我们将去往何方？”他可能从儒学那里接受了圣王美政的理念。他反复标举尧、舜、禹、汤和楚国三后，认为他们开创的理想盛世乃是惟一的光明前景，他们走过的道路才是后王可继踵武的正确道路；为了楚王能臻于这一境界，他愿意献出全部青春来充当先导，甚至为此“虽九死其犹未悔”。与这条社会历史路线相辅的，显然还有举贤授能的施政举措。在《离骚》、《天问》中，诗人列举了傅说、吕尚、宁戚等等一系列历史人物的风云际会，阐述了圣君贤相相辅成功的历史经验。推究社会史，如果说圣王美政这条历史道路，还带有对西周盛世那种由家族公社形成的内奴隶制的温馨色彩的回忆的话，那么举贤授能则刚好是世卿世禄制崩溃后，士的阶层崛起，新兴地主政权须仰赖这些地位卑贱却广有神通的人们的支持这样一种社会现实的结果。当然，支持圣王美政崇高理念的还有崇德修己的一条。在诗人看来，只有经过不断刻苦修养，具备深邃的美德，才能有位有土主宰国家。这种人格理性至上的观念也可能来自儒学，但我们看《庄子·天下篇》也未尝不讨论“内圣外王之道”，只不过认为此道已经不存，以后人不及见，深为可悲而已。怀抱上述博大精深的学问，屈原年青时曾为楚国左徒（副相），大得怀王信任，所谓“人

则与王图议国事，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但是，随着世事的骤变，屈原的政见与做人风格很快便遭人嫉恨，本传说楚王使屈原造为宪令，上官大夫欲夺之，屈原不与，因谗于楚王，于是“王怒而疏屈平”。但据刘向《新序·节士》（这是本传外秦汉文献中仅存的一份关于屈原行事的资料）称：前此屈原曾为使于齐，促成齐楚联盟，为秦所愚，秦于是使张仪之楚，收买楚国权臣上官大夫靳尚、令尹子兰、司马子椒及怀王夫人郑袖，共谗屈原，屈原遂放于外，乃作《离骚》。综观屈赋，揣度人情，似《新序》所载近是。

“义愤出诗人”。这义愤用上古的概念，当即如司马迁所说，屈原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诗人的心灵是如此怪诞的东西，愤懑、怨毒，紫得近黑的情感之渊，竟会迸发出宇宙间瑰丽壮美的锦绣章句！这首用 2477 字、374 句组织成的长诗，大约不只中国诗史，就是在世界艺术史上，也完全称得起是一宗奇珍，它是同荷马史诗、达·芬奇的绘画、米开朗基罗的雕塑齐陈并列而当之无愧的。这本是一首政治抒情诗，但诗人却以天帝之胤乘太阳龙车上下四方追求女神为框架，以虬龙鸾凤、飘风云霓、灵修美人、鲜花香草为喻体，神话与历史同陈，现实和幻境交错，写得天风海浪，虹吸鲸吞，大气磅礴，恢宏高远，如天孙织成之云锦，金碧辉煌，不可逼视。屈赋的最早注本、汉武帝时的淮南王刘安的《离骚传》，曾经给这首诗以无以复加的赞颂，说：“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誉，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时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迳而见义远。其志洁，放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